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脩全集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脩全集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第一冊

李逸安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第二冊

李逸安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第三冊

李逸安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第四冊

李逸安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第五冊

李逸安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歐陽修全集/(宋)歐陽修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652-9

I. 歐… II. 歐… III. 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 - 中
國 - 北京 IV. I214.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3618 號

責任編輯:劉尚榮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歐陽修全集

(全六冊)

李逸安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9¹/₄印張·1907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冊 定價:160.00 元

ISBN 7-101-01652-9/1·275

歐陽文忠公小景



前言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傑出的文學家。他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不僅親身參與了許多重大政治活動，而且廣泛涉足於史學、經學、文學理論批評、金石學、目錄學等領域，在諸門學科中都頗有建樹，表現出了多方面的學識和才華。尤其是他對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卓越貢獻，更奠定了他劃時代、開風氣、雄踞一代文壇的領袖地位。

一

關於歐陽修的籍貫，歷來有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市）、吉水（今江西吉水縣）、永豐三種說法。據他自己所記，這一氏族原本是夏禹後裔，傳至越王勾踐五世孫時被楚所滅，封在烏程歐餘山（今屬浙江湖州）之陽做歐陽亭侯，子孫因封命氏，遂姓歐陽。至歐陽修第十七代祖歐陽琮任唐朝吉州刺史，「子孫因家於吉州」。「其後世或居安福（今江西安福縣），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

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歐陽氏譜圖序》）。歐陽氏族雖曾有過顯赫發達的歷史，但是傳到歐陽修祖父歐陽偃、父親歐陽觀時，家境已經衰落。歐陽偃雖「少以文學著稱南唐」，但終身未曾應考進士（《歐陽氏譜圖序》）。歐陽觀也只做過判官、推官一類小官。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六月二十一日，歐陽觀在綿州（今四川綿陽）推官任上，歐陽修出世了。

歐陽修四歲時父親病故，全家生計無着，由母親鄭氏帶領投奔時任隨州（今湖北隨縣）推官的叔父歐陽曄。家道艱難，無力延師，出身「江南名族」的母親便親自擔當起歐陽修的啓蒙重任，缺少紙筆，就「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因家「貧無藏書」，歐陽修只能「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不過他「敏悟過人」，常常「鈔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由於他刻苦好學，很快「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以上《事迹》），「及冠，嶷然有聲」（《宋史》本傳）。

仁宗天聖四年（一〇二六），歐陽修通過隨州州試，得薦名於禮部。兩年後游學漢陽，以文章受知於學士胥偁，并隨胥偁赴京師汴梁。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國子監試、國學解試雙獲第一。天聖八年（一〇三〇）正月，禮部試再獲第一。三月，崇政殿試中進士甲科，授教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歐陽修抵西京洛陽任職。留守錢惟演幕下廣聚名士，使他有機會結交了尹洙、梅堯臣這兩位文學知己，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傳）。對於歐陽修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從此開始了他幾

經浮沉的宦海生涯，和影響巨大的文學創作活動。

一一

景祐元年（一〇三四），歐陽修再入汴京，以王曙薦召試學士院，充館閣校勘，參與編著《崇文總目》。這時，建國僅止七十餘年的北宋王朝正面臨着自真宗以來愈來愈嚴重的社會危機。一方面遼與西夏屢屢進犯，西北邊陲烽火不熄。另一方面統治集團因循苟且，腐敗成風，爲了滿足驕奢淫逸、侈靡無度的生活，對人民橫征暴斂，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各地士兵、農民、少數民族起義不斷。爲了改變國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的狀況，朝廷中的有識之士不斷提出各種改革主張。

景祐三年，改革派代表人物范仲淹因直言指斥時弊觸怒宰相呂夷簡而被貶饒州。歐陽修堅決支持范仲淹，結果亦被逐出京師，謫爲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再移乾德（今湖北光化）令，又調武成軍（今河南滑縣）節度判官。年僅而立、仕途伊始的歐陽修第一次參與政治斗争，便嚐到了它的無情與嚴酷。在這次事件中，朝廷準納呂夷簡奏議，以「朋黨」榜示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揭開了宋代黨論不斷的序幕。

康定元年（一〇四〇），西夏兵大敗宋軍於延州，朝廷上下驚恐。仁宗無奈，解除了「越職言事」之禁，啓用范仲淹、尹洙等抵禦西敵。歐陽修也結束了歷時四年的謫居生活回到京師，復官館閣校勘，繼

續修訂《崇文總目》。書成，改官集賢校理。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五月，歐陽修滿懷憂國憂民之心準詔上書，痛陳弊事，却未見聽納，於是自請移外，通判滑州（今屬河南）。

這次外任時間極短，慶曆三年春即被召回，以太常丞知諫院，再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這時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相繼起事，西夏和桂陽洞「蠻」不斷擾邊。面對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的形勢，仁宗只得依賴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朝政，並採納了范仲淹《條陳十事》中的改革措施，「慶曆新政」開始頒行。

新政觸犯了守舊派的利益，自然遭到他們的抵制與反對。游移不定的仁宗轉而倒向守舊派，革新派逐漸受到冷落。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四月，歐陽修被遣出使河東。八月，以龍圖閣直學士任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慶曆五年初，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接連罷官，「新政」徹底失敗。

在革新派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歐陽修挺身而出，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為之申辯，指出「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又一次表現出他「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的剛正品質，及「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四朝國史》本傳）的敢言精神。結果益遭「新政」反對者的忌恨，也使仁宗頗感不快。恰巧歐陽修外甥女張氏犯法，反對派趁機攀牽構陷，羅織其罪。雖然最終「辨無所驗」，但仍被「除延閣之名」，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再徙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

慶曆新政的失敗，對於歐陽修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與封建時代大多數被黜落職者不同，身

處逆境的歐陽修始終夙志不改，《宋史》本傳稱其「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確爲實錄。當然再度被貶，匡時濟民的抱負一時難伸，免不了會有鬱悶煩惱的侵擾。他便自號醉翁，於吏事之外徜徉山水，寄意詩文，借以略遣情懷。《豐樂亭記》、《醉翁亭記》、《梅聖俞詩集序》、《游琅琊山》、《朝中措》、《喜雨》、《寄生槐》、《鸚鵡螺》、《食糟民》、《廬山高》等不少名篇佳作均作於此時。

至和元年（一〇五四），歐陽修回朝，詔判流內銓，旋爲宦者中傷去職。改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又差勾當三班院，十年漂泊徙外的生活終於結束。從此，他仕路通達，官職不斷升遷。從至和二年起，先後除授翰林學士、集賢殿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通進銀臺司，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兼判秘書省，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充群牧司，轉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一〇六〇）十一月拜樞密副使；嘉祐六年閏八月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嘉祐七年進階正奉大夫加上柱國；嘉祐八年進階光祿大夫。不到十年便由一名侍從近臣躍升爲執掌軍政樞要的顯貴。

歐陽修於中書任上參與的重大事件是「濮議之爭」。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仁宗病逝，濮王之子趙曙承祧繼位，是爲英宗。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詔議崇奉濮王典禮。歐陽修等主稱「皇考」，呂誨等主稱「皇伯」，議久不決，後以太后手詔，遂定「皇考」。歐陽修的意見雖說最終占了上風，但在整個事件中，他也一直受到臺官的「醜詆」抨擊。

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元月，英宗卒，神宗繼位。歐陽修因於喪服內誤穿紫襖，又遭御史彈劾，臺官

蔣之奇等更編造「私從子婦」、「帷薄不修」之語，對他誹謗攻擊，落井下石。此時的歐陽修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風霜所迫，鬢髮凋殘」，「肺肝渴涸，眼目耗昏」，爲了應付一次次的「構造中傷」，已然「精神耗盡」。加之政務繁劇，更覺力不從心（《亳州乞致仕第一表》）。於是固辭請外，以刑部尚書出知亳州（今安徽亳縣）。

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拜相，開始實施變法。富弼、蘇軾、蘇轍等人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先後去官改任。歐陽修這時正以兵部尚書知青州（今山東益都），他擅自「止散青苗錢」（《神宗舊史》本傳），受到了朝廷的呵責。早已心力交瘁的歐陽修，急流勇退辭官歸田之意更堅，於是接連上表，告老求去。熙寧三年七月，他得知蔡州（今河南汝南），改號六一居士，再明心迹。一年後（一〇七二）便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自景祐以來魂牽魄系二十二年的歸穎之夢終成現實。「誰如穎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寄韓子華》），擺脫了繁瑣政事的歐陽修，得以精心整理修改舊作，《居士集》、《六一詩話》等重要著作均編寫完成於此時。

熙寧五年（一〇七二）閏七月二十三日，疾病纏身、詩文爲伴的歐陽修，走完了他六十六載的人生旅程，溘然長逝於穎州西湖之濱。身後特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歐陽修具有傳統的忠君憂國思想。匡弊圖治，改變國家貧弱不堪的現狀，是他苦苦奮鬥不懈的目標。我們從他「慶曆新政」之前所寫的《原弊》、《準詔言事上書》和《本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革新、務實的觀點與主張。

《原弊》主要反映了歐陽修的重農思想。他認為「為政之本」在於「務農」，而「務農之方」是「節用以愛農」。可惜當今朝廷非但不「勤農」，反而以「誘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來「耗農」。這是國家貧困虛弱的根源之一。在《準詔言事上書》中，他又進一步分析造成當時「夷狄叛」、「盜賊起」、「水旱作」、「民力困」、「財用乏」、「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的原因，是朝廷有「不慎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之「三大弊」故也。「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而「萬事不可盡言」，其「當今急務」在於「用兵」、「擇將」、「聚財」、「謀策」、「任臣」這五大事。他的這一主張，在其後所撰並於晚年精心修訂的《本論》中，論述得更為詳盡具體。他認為「治本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

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這裡歐陽修特別強調了建立制度是理財、治兵的前提條件，而厲賢、任人則是執行制度的保證。可是如此關乎國家成敗興衰的大事，「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以至當今「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歐陽修深感解決的良策唯有如范仲淹所言的「更張以救之」，所以他不畏禍責，身體力行，積極支持和參與了「慶曆新政」。

既然歐陽修是把改革弊政視爲己任，那麼何以在他晚年却與厲行「熙寧變法」的王安石有所抵牾呢？「擅止俵散青苗錢」，是不是表明歐陽修的思想開始趨向保守了呢？比較一下慶曆新政提出的「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三）十項建策，與王安石在「理材」、「征誅」、「大倫大法」思想指導下推行的青苗、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方田等法（《宋史·王安石傳》），其實并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歐陽修在經歷了「新政」的挫折與失敗後，悟徹到「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幸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要想完成根本方針的改革，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細末枝節的變化，又於事無補，所謂「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與田元均論財計書》）。如果一次又一次的變法，帶來的僅止是號令制度的反復更改，那麼這無異於抽刀斷水，其結果是「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準詔言事上書》）。因而他於變法，采取了更加和緩穩妥、講究實效的態度。